

# 战略轻率还是新的均势？

〔俄〕季莫菲·博尔达切夫（Timofei Bordachev）◎

**【内容提要】** 毫无疑问，当前是二战以来国际环境变化最为显著的时期。被普遍承认的准则和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缺失成为当前国际局势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相互尊重可能是大国，甚至主要大国关系中最稀缺的东西。中国和美国都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盟友，他们正为此而努力。欧洲政治将进入新时期，届时欧洲和作为整体的西方将不再具有影响国际事务的垄断性地位。西方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终结并没有带来一个新的、对所有国家更公正的秩序安排。相反，世界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外交和混合型军事对抗的时代。由西方全能力量相对衰弱导致的相对不确定的时期正在结束，一场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新的斗争正在上演。

**【关键词】** 均势 战略轻率 全球主导权 西方自由世界秩序

**【作者简介】** 季莫菲·博尔达切夫，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智库瓦尔代欧亚俱乐部项目部主任。

当前无疑是二战以来国际环境变化最为显著的时期。尽管 1990 年代初期苏联的解体曾导致国际体系的严重失衡，但并未引发国际体系内在特征和基本过程的巨大波动。只有当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才可以与 1945 年国际体系的根本变动相提并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曾被宣称为普适的，但最终证明只是在某些国家相对完全主导下的一个短暂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享受了几乎完全的行动自由和充分发挥其优势的绝佳机

《全球秩序》2018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第 47~62 页。

会。由此，这些国家内政的优先事项和氛围被任意地延伸到外交政策中，这导致国际安全变得极其依赖几个最主要大国的内政变动。在过去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全球各国政府努力构建国际制度和国际法体系，就是为了阻止上述情形的发生。在19世纪，战争是出于外交需要；在20世纪，战争是为了争夺资源和主导权；在21世纪初期，战争则是为了解决战乱国家的国内问题。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的干涉，当然也包括对叙利亚并不成功的干涉。可以想见，如果非西方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选择诉诸武力，他们会采取更加迂回的方式，并将目标严格限定在外交政策的范围内。

## 失去“稳定器”的世界

另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是国际关系中两个主要“稳定器”——被普遍承认的准则和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缺失，这是当前国际局势最重要的特征之一。1991年之前，存在两个强权国家可以把它们的意志强加在除了中国和某种程度上的印度的大部分国家身上。在两极格局最终解体后，以普遍接受的制度为基础的公平竞争也曾有望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但是冷战的实际赢家决定以自己的利益去建构这个世界，并创造一个单极体系，这就是我们所知的“自由世界秩序”。这一秩序被一个无可争议的规则维系着：美国是世界政治经济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也只有美国才能违反国际法。至于其他国家，要么被邀请纳入西方世界，成为高级合伙人，要么就只能袖手旁观，老老实实地享受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西方同时也确信，经济因素早晚会将中国纳入西方的游戏规则和政治体系。

然而，这一计划并未奏效。俄罗斯已经强大到足以保护其国家利益。中国则坚持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应当进行改革，国际规则应当更加公平。不过，被所有国家尊重的规则并没有出现。美国似乎选择了一种策略，即如果这些规则不是美国所认同的，那就宁可没有规则。其结果是，世界陷

入了更加混乱和危险的状态，甚至比 1914 ~ 1945 年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情况还要严重。1945 年由战胜国缔造的国际秩序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最彻底的变革，但这一秩序已然开始崩塌。

寻找历史类比并分析历史经验，既是理解当代局势的最佳方式，也是激发解决当代矛盾思路的最佳方式。特定的模式和关键因素决定着既存体系的稳定性，人们通过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来寻找这些模式和因素。如果我们要寻找历史类比，最接近当前局势的应当是从 1871 年德国统一到 1914 年一战爆发之间的那个时期。那一时期的根本特征是，西欧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大国之间因为利益分歧在边缘地带的大量小型冲突，以及贸易和人类交往的全球化。

例如，在 1913 年，英国和德国的贸易规模最为庞大，但仅仅一年之后，两国却成为死敌。德国也是俄国最大的外部投资者，在俄国经济中投入了 3.78 亿金卢布。那时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签证或边界。欧洲贵族是全球精英，多数欧洲国家的王室都属于同一个大家庭。在之前的 40 年里，主要的全球性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涉及三个以上国家的最后一场冲突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 ~ 1856）。自 1815 年以来，还没有真正发生过大规模血腥战争（当然，这没有包括殖民侵略对人民造成的伤害）。与此同时，国家间关系被相互猜疑所支配。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一场持续 30 年的军事和外交冲突，其中包括夺去数千万人生命的两次世界大战。

今天我们看到了某些类似的情形。随着贸易全球化的进行，政治关系日益复杂棘手。就像在 20 世纪初期那样，许多人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阻止形势升级为全面战争，所以他们可以轻率地处理那些引发冲突的根源性问题。美国政府公开无视国际法，称其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华盛顿的行为反复无常且蕴含风险，正在侵蚀着国际安全。国际体系已然失衡。欧洲正在迅速丧失推进和平事业的能力。中国和俄罗斯敦促公平竞争，尊重国际机制，维护全球化成果。然而，他们也不得不频繁针对西方国家的行为作出对等的反应。此外，还有一种新的“和平倾向”（habit of peace），认为核武器一定可以确保大战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当前情况与 1871 ~

1914年并无二致，而通过对后者的研究，我们可以避免形势滑向重大冲突。我们甚至可以搞清楚，到底怎样做才能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秩序。

经验告诉我们，国际秩序既要有物质基础（军事力量），也要有非物质基础（尊重、规则和对合作伙伴合法性的承认）。在历史的某些阶段，一种基础的权重会大于另一种基础。1871~1914年和1945~1991年的权力均势本质上源于物质基础。然而，在这两个时期，权力均势和直接军事遏制是导致而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全面冲突。这两个案例的结果都是一个或数个大国的失败，一战中是在直接军事冲突中失败；而冷战中，则是在超级大国随时开战的威胁笼罩下，在边缘地带的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中失败。

1648~1871年的欧洲秩序源于维也纳会议，其本质截然不同。就像整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样，这场会议基于（君主）合法性、相互尊重和对游戏规则的协商一致。尽管政治体系各有不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创造者和维也纳和会的参与者理所当然地相互尊重并承认彼此的合法性。这种秩序更早的例子可以在古代东方的历史中找到，中国春秋时期各国的关系就是如此。在公元前14世纪，五个诸侯国的统治者成立了“大国俱乐部”，并以“兄弟”相称，古代中国的国家间峰会就像是19世纪欧洲和平大会的前身。在欧洲，相互尊重和承认合法性的原则一直持续到1917年俄国革命，在随后的一百年中，这两个原则都在国际关系中有所缺失。

当前，相互尊重可能是大国，甚至主要大国关系中最为稀缺的东西。这一点在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中尤其明显。在某些情况下，尊重的缺失源自对合作伙伴内部稳定性和合法性的主观评估。这就是美国及其多数盟友看待俄罗斯和中国的方式。从其陈述和评估来看，美国的将军们和多数专家都认为，一旦事到临头，中国将不会具备足够的决心来应对问题。他们认为，尽管中国拥有经济实力和持续增长的军力，但其并不准备面对严重的压力和军事挑衅。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将中国称为两个超级大

国中的一个。华盛顿和欧洲的大多数专家和决策者也相信，俄罗斯是“泥足巨人”，其经济无法承受长期的对抗，其政治体制将不可避免地更符合西方要求的秩序所取代。这是上届政府所持的观点，多数新上任的共和党领导人也越来越多地认同这一观点。就欧洲而言，其押注于俄罗斯的内部变化，但这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寻求改造一个国家是解决分歧最可靠的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不可能承认对手的合法性并表达相应的尊重。西方对朝鲜或印巴关系的态度，还有半点尊重吗？

在其他的案例中，缺乏尊重既是由于主观地揣度对手意图，最重要的也是由于主观上的言行不一致。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多地感到，无法认真对待新一届的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及其核心圈子成员威胁性的、矛盾的和不负责任的言论并没有转化为实践，他们反复无常、近乎疯狂和惹人反感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结论。其结果是，世界开始将新一届美国政府视为“纸老虎”。令人遗憾的是，欧盟和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某些决定，也并没有给予中国和俄罗斯足够的尊重，对与欧洲紧邻的俄罗斯尤其如此。很多俄罗斯人无法理解欧洲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的实质。俄罗斯人看到了“阿拉伯之春”和欧洲难民危机的后果，他们很好奇欧洲人是否能够看清他们政治决策和后续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此外，这也使国际关系陷入知识和政治的僵局。

相比而言，俄罗斯和中国对彼此就更加尊重。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认真倾听彼此对于瞬息万变的外交和治理议题的看法。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阅兵式，该阅兵式遭到了西方领导人的公开抵制。2017年5月，俄罗斯总统是唯一一位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大国首脑。中国首都似乎是俄罗斯领导人最常去的外国城市。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会晤比他们与其他任何领导人的会晤都更加频繁。仅2017年，这样的会晤就有两次。人们的印象是，这些会晤和讨论已经成为亲密朋友间交换信息和观点的稳定渠道。

然而，怀疑者会说，尽管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持续增长，但两国的良

好关系并没有对经济和双边贸易产生很大影响。例如，根据中国估计，2015 年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达到了 30 亿美元。2016 年的官方统计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俄罗斯专家表示，这使得俄罗斯成为继英国和荷兰之后，中国在欧洲的第三大投资国。贸易正在持续恢复，俄罗斯一些新的产品类别进入了中国市场。因此，经济在双边关系中缺席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然而，从战略上讲，另一件事情对俄罗斯更加重要。毫无疑问，经济在国家关系发展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历史上看，贸易和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国家间强有力的政治关系并消除冲突的危险，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让我们思考一些例子。正如上面提到的，众所周知，一战前夕，英国和德国的贸易往来极其活跃，德国是俄国战前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尽管如此，这并没有阻止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武装冲突在这些国家之间爆发。

1960 年，苏联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贸易和经济伙伴。那时的中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孤立。在此前的十年里，中国也是苏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只有东德曾经在 1957 年一度超过中国。中国雇用了苏联工程师和军事顾问，苏联为中国大量工业设施提供了技术和信贷。例如，在 1955 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12.9 亿美元。但这些都无助于阻止政治关系急剧恶化。从 1960 年到 1969 年，中苏两国从盟友滑向了局部武装冲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几乎所有接触都逐步停止，连接两国的铁路也被停用。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是两国领导人在如何看待双边和国际关系的关键问题上突然产生了分歧。

还有一些更新的例子。截至 2014 年，欧盟控制了俄罗斯超过 52% 的对外贸易，这使其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一些欧洲外交官甚至半开玩笑地称欧洲是“俄罗斯贸易的大股东”。应当注意的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一直保持着这个地位，直到现在，欧盟仍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占有 46% 的份额。仅仅在几年前，德国还是俄罗斯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直到这一位置被中国所取代。即便如此，毫无疑问，俄罗斯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的政治关系正处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点。双方都在发布

措辞强硬的声明，并进行以对方为潜在对手的军事准备。

当然，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就其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而言，中美关系仅次于美欧关系。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总额达到4871亿美元，美国向中国的出口总额达到1157亿美元。然而这并不能阻止美国在敏感地区问题上周期性地挑动中国神经。由于在关键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缺乏共同愿景，尽管中美两国关系仍然以合作为基础，却已处于下行通道，并通向一种隐性的对立。中国和日本之间也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然而，这两个亚洲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很难让人放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或中日之间可能会爆发战争。相反，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高水平的经贸联系并不能保证政治上良好的关系——尊重和互信。相互信任是国家间解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唯一办法，由此可以避免各国由于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而不断加强军事准备的困境。尽管基于同样的信任和共同的世界观，西方国家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国家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原则上不会发生战争，但也正是在这种相互信任中，我们找到了西方团结动摇的根源。

然而，在西方国家的特殊关系之外，尊重和相互承认很难被视为主要国际竞争对手间关系的因素。在19世纪初，这一点同样没有那么明显，这也凸显了今天与那个时代的一个危险共同点，即为了战术上的胜利和国内民众的政治支持而去冒险制造对立。美国的政策尤其如此。鉴于中东和东北亚局势升级的不确定性，美国新一届政府的战略轻率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导致战争。目前欧洲没有那么鲁莽，因为其军事实力更弱。尽管如此，欧洲大国通过支持2014年的乌克兰政变并指责俄罗斯干涉乌克兰内政，在这一问题上制造了军事和外交冲突。这两种情况下，在面对外部威胁时，获得短期利益的渴望和巩固国内团结的需要占了上风。然而，俄罗斯和中国也必须做出决定以回应对手的战术攻击，而非仅仅基于其长期战略行事。但是，请允许我重申，莫斯科和北京负责任的行为是受到其国内政治组织支持的。

一百年前，大国的战略轻率导致了世界大战，尽管他们互相尊重并承

认彼此的合法性。为了避免被拖入冲突，当新一届美国政府试图向俄罗斯和中国表达尊重时，仅仅承认其维护各自价值的权利是不够的。当涉及重要军事强权的利益时，我们需要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在创造新的全球秩序的条件成熟之前，世界政治将仍然是大量“小交易”的集合。我冒昧揣测，美国及其盟友不会接受任何“最终解决方案”，除非该方案可以保证他们成为无可置疑的赢家。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是，他们将加强保护措施，以防止鲁莽的赌徒带领世界走向战争边缘。这就是为什么交易应当由外交官在国际组织和论坛上达成的原因——这也是20世纪唯一的成就。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终结并没有带来一个新的、对所有国家更公正的秩序安排。相反，世界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外交和混合型军事对抗的时代。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由西方全能力量相对衰弱导致的相对不确定的时期正在结束。它正被一场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新的斗争所取代。这场斗争的主动权属于美国，迄今为止，美国表露出最大的决心，以摧毁其自身在冷战后建立的所有人都相对受益的游戏规则。根据所有的评估，一场前所未有的军备竞赛正在全面展开。顺便说一下，从2018年3月1日呈现的最新武器来判断，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卷入到这场竞赛中来。俄罗斯领导人参考了苏联的经验，苏联为了赢得一场对称的竞争而承受了过重的负担。多数俄罗斯领导人都目睹了这个我们自己建立的超级大国的崩溃。有些人提出的回应策略将会导致更大的不对称，其目的是抵消威胁，而不是创造威胁。美国正在采纳一些观念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过去似乎是不负责任和愚蠢的，但现在却只能被看作一种真实意图的声明。很明显，俄罗斯总统的决心也受到了美国最近关于核战略的程序性文件的挑衅，这些文件主张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可能的。

## 新背景

与此同时，这一斗争正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发生。中国已经在全球层



面加入了这一斗争。尽管北京不像美国那样，把全球主导权宣称为自己的目标，但根据所有的评估，其将被迫在某些方面寻求主导权。中国经济巨大的规模及为中国经济提供资源的需要，中国的巨大体量以及发展水平，都将促使其围绕自身需要建立一套立体化的、友好的国际关系体系。印度没有全球野心，但正在寻求对其周边利益的尊重。这迫使德里积极建设地缘战略组合，而这引发了北京的不安。俄罗斯不能在中印之间做出选择。印度本身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在决定欧亚地区是成为一个合作区域还是中印地缘战略竞技场方面，印度扮演着重要角色。

俄中两国维持不同以往的良好双边关系并共同参与世界政治，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环境的重要因素。这也将赋予核超级大国俄罗斯新的责任。因此毫不意外，俄罗斯总统在讲话中称，新的武器系统本身并不是目的，甚至不是为了像美国和（越来越多情况下的）中国那样站在全球政治的顶点。仅凭自身的军事实力，俄罗斯需要在其周边以外控制的地区，甚至比印度还要小。莫斯科认为，新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于建立和巩固全球力量平衡是必要的。在现代条件下，只有这种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力量平衡才能保证人类不会陷入全球冲突。

关键是要明白，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会考虑将一个军事上软弱且缺乏自信的俄罗斯视为潜在的盟友。他们将为争夺俄罗斯而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迹象已经显现。俄罗斯加入其中的任何一极将不可避免地迫使其他大国也作出自己的选择。这种全球军事政治体系的极化将成为人类终极竞赛的重要一步。这种“战略轻率”已然具备一种惯性，并将被国际体系的结构强化，而这个体系实际上正是 1914 年欧洲的翻版。当所有的棋子都以最适合冲突的顺序出现在棋盘上的时候，仅仅需要一声令下，其中一个阵营将会越过没有回头路的临界点。

在这种背景下，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 2018 年 3 月 1 日向联邦议会发表了讲话，终结了甚至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俄中军事联盟的议题。拥有大量先进的现代武器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俄罗斯是否需要强大的支持者来确保其安全的议题。中国的一些政治学家讨论了北京和

莫斯科之间建立正式联盟的可能性，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条款，而另外一些中国专家则反对这一提议。应该提到的是，一个假想的联盟对俄罗斯来说并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与欧洲和亚洲的中小国家不同，莫斯科在国家安全或抵御外部威胁方面没有与任何人结盟的需要。俄罗斯有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抵御任何外部威胁。此外，它不需要为美国海军主导权的问题费心。

## 中俄战略关系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中俄关系会对世界稳定（或不稳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考虑到美国日益轻率的政策取向和欧洲不友好的被动局面，这个问题尤其重要。美国行为的不可预测是双倍的：没有人知道精英们对总统开战的后果，也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总统自己有什么期待。美国和欧洲这样的关键行为体在不久的将来并不会变得更负责任或更可预测。因此，更多的责任将由世界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来承担，这些国家的核心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而中俄关系不应受到西方惯有的对莫斯科和北京关系中不可预测的行为的影响。

中俄关系的正式性质不能与国家间的外交政策议程混为一谈。应当站在维护全球和平需要的视角，来分析假想中的中俄同盟的潜在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我们时代和1890~1914年的“战略轻浮”时代类比，在很多方面，恰恰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缺乏正式的联盟，才使得这个类比最终不能成立。

反之，如果中俄联盟建立起来，该联盟将是在当前对协约国四国同盟局面的重现。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包括守成国和崛起国的组合方式，要么试图改变现状，要么干脆想把桌子掀翻。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莫斯科和北京不应该急于在这个历史阶段正式建立他们的同盟关系。这将使国际体系面临危险的僵化，从而在冲突中更加脆弱。考虑到当今国家外交政策的特性和世界政治的体系性特征，这一点尤其具有威胁性。就俄罗斯而

言，它需要朋友、战略伙伴，甚至是在困难时期可以依靠的盟友。但显然，它不需要庇护人。这意味着它可以继续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唯一的平衡者，否则中美两国就会为争夺全球主导权而陷入对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关系，与它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任何本质和精神上的不同。

显然，失败的单极世界不是在被一个更稳定的两极或多中心的国际体系所取代，而是要被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控制的混乱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评估不同国家之间的分歧到底是客观的、主观的还是策略性的，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使从理论上讲，这种混乱是冷战后形成的不公平秩序的自然结果，这可能会导致一场全面的危机。最重要的是，这场危机正使得我们面临的战略文化的退化（archaization）愈加迅速。即使是最坚定的以现代方式处理国际问题的信徒，对此也无法抗拒。例如，德国代理外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在慕尼黑的讲话中称，欧盟“在食肉动物的世界里不能成为素食者”。尽管柏林传统上是多边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外政策的后现代主义——最活跃的推广者，但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声明却恰恰出自一位德国政治家。

## 美国发起了新的竞争

那些最近认为外交政策已经极度过时的国家，比如印度，或者某种程度上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他简直是最原始的政治思想和行动的化身——已然成为最精明和最适应现状的参与者。这种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战略文化的变迁，在未来可能重新将一些似乎已被遗忘的问题，如国家领土边界不可侵犯或主权国家独立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利等摆上台面。如果美国总统能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威胁要摧毁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为什么其他领导人不能在国家利益受创的情况下做出同样的事情呢？这个问题仅仅涉及对威胁规模的主观评估以及避免这种威胁的物质手段的有效性。

对美国来说，新政策将不是适应其不喜欢的现实。任何无法导致美国的统治和繁荣的现实对其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原则上，只有在与其他国家

家的关系中处于无可挽回的弱势地位，一个国家才会放弃出于自身的目标塑造现实的努力，而只是被动地适应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现在正走上这条道路。它已经不够伟大，没有能力创造制度和规则。也许，有人认为俄罗斯能够在未来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或是在没有多边联盟和机制的情况下行事，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或金砖国家这样的组织和机制对俄罗斯实现其国家发展目标而言是必要的。毕竟，发展不一定需要采取为了生存才会进行的支配活动。

美国则是另一码事。美国在新战略中几乎没有承认现实，这体现在其制定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最大的军备计划，以及新总统的执政风格。这是一场争夺全球统治的新冷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与以往截然不同——更加随意、愚蠢和直截了当——的美国政策，这是美国的自负和对其使命的真诚信念的混杂产物。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没有限制，这削弱了其行动智慧和创造能力。从现在开始，美国的政策，尤其是在欧亚地区的政策，将重新由罗纳德·里根的冷战战略——“我们要赢，他们会输”决定。

在这场斗争中，挑拨离间其他主要国家，使其相互对立，正在变成一种斗争工具，正如以往一度发生的那样。由此，中印两国的矛盾被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挑拨，尽管两个大国显然足够明智，并未被这种挑拨所误导。中印的分歧本质上并非客观而不可动摇，虽然两国在总体的欧亚问题而非外围问题上存在双边难题。正如我们经常从印度同事那里听到的那样，印度的战略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包罗一切的，相反，他们有一份宽泛地界定出自身优先事项和国家利益的清单。

在这种既定的国际环境下，对俄罗斯、中国和其他欧亚国家而言，想方设法防止这种混乱扩散到他们所在的欧亚地区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大欧亚共同体 (the Great Eurasia Community) 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比对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和信赖，那么从长远来看，这个共同体背后的政治理念就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理念。但首先，要防止欧亚地区内部形成相互敌对或致力于角逐权力中心的多极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中俄两国由于军事、

政治和经济能力，仍会是关键的参与者。美国及其在欧洲的主要伙伴——英国、德国和法国——似乎都在推行旨在鼓励欧亚地区内部竞争的政策。

## 欧洲的转变

总的来看，欧洲正逐步回归到一种更加灵活和积极的政策。这不仅仅体现在文字和宣言中。欧洲显然正处于对其精英、政党和政治体系进行彻底改革的开端。选民的厌倦、过去十年间的大量危机以及欧洲建制派的整体退化，正缓慢而坚定地推动旧世界走向新的政治现实。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面临领导层的剧烈退化以及他们迫于形势进行的调整，在另一些情况下，现有的领导层会被新的领导人和政党所取代。对于欧洲政治家而言，20世纪最后十年是一个有着无限红利和极少约束的时代，这种情形使得他们在面对战争与和平这样重大的问题时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当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利可图时，就很容易上演侵略行为。一些国家解体了，包括欧洲内部的国家。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大国因为不服从新主人而被打翻在地。1999年春天，它被直接轰炸，其领导人身陷囹圄。在那个行将终结的时代，伴随着胜利的狂喜，海牙法庭也顺带成为西方和欧洲绝对权力的象征。

但是在2008年以后，形势开始变化。首先，在享受其成功的同时，欧洲犯下了大量战略错误并卷入了一系列危机之中。其次，中国和没有被扼杀在1991年的俄罗斯正运用不断增长的能量来挑战西方对权力的垄断。最后，欧洲没有面临严重问题的形势本身，葬送了欧洲的领导和领导力。权力被交给了那些委婉地讲不太出色的人。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之类的人都只是徒有其表，并在自身周围造成了领导力真空。上面提到的“战略轻率”，正是欧洲领导人们的真实写照。其造成的悲惨后果包括乌克兰内战、中东难民潮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的深刻危机。上面提到的人物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紧接着的就是安吉拉·

默克尔（Angela Merkel），她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至少能制定出一个多少连贯的（也许还比较清晰的）欧洲议程的领导人。不幸的是，她的主要政治遗产将不是欧元区的稳定机制，而是欧洲的南北分裂和低至冰点的俄欧关系。

新的欧洲政治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和作为整体的西方将不再具有影响国际事务的垄断性地位。就目前而言，美国不愿接受这一前景，其国内政治波涛汹涌，对外侵略性日益增长，唐纳德·特朗普就是这一局面的象征。由于欧洲在传统上处于更加脆弱的境地，欧洲人将比美国人更早地接受新的形势。新一代的政治家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似乎就更倾向于与中国合作，而非向中国说教。新一代政治家的另一位代表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兹（Sebastian Kurz），明确地表现出与俄罗斯修复关系的强烈愿望。德国自由民主党领袖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在这一问题上也是如此。新一代领导人在欧洲掌权的时间越早，旧世界就会越早地适应新现实。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欧洲精英和政治体系将在多长时间内获得新生。同样不清楚的还有欧洲一体化的结果，在过去50年，这是欧洲最主要的事业。对选民日益保守的诉求作出回应，将使得主导性政治力量右转。这对建基于相互开放和凝聚在多元化之上的欧洲哲学不是好消息，而这一哲学的核心，正是一体化思想。更有可能的是，中国和其他的伙伴会在即将来临的欧洲领导人更迭中受益。欧盟在世界上的新角色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内部权力更替结果的左右。雄心勃勃的平民主义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计划领导这场运动。有理由希望，这个新生的欧洲将不会与大欧亚共同体为敌。到目前为止，欧洲领导人对自己无法强力掌控的变革持保守态度。最有可能的是，他们的中期战略将聚焦于分裂欧亚地区。

## 欧亚地区的议程

欧亚地区的中小国家，尤其是中等规模的国家可能会不自觉地支持这

一战略。这些国家已经习惯于通过引入地区和域外伙伴来确保主权利益的安全。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东盟国家接受并欢迎美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这样的诱惑在欧亚地区的大陆部分也将产生影响。即便仅从理论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国总是会在国际合作和一体化项目中做出最大贡献。当然，他们得到的也更多。不同规模的国家会从互动中得到各自不同的利益，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明白这一点，并在共同发起项目时将其考虑在内，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在日益增长的混乱和倒退中，不会被实力更强的伙伴盘剥的合作将变得弥足珍贵。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相比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合作和一体化获得的绝对利益更加重要。制度和规则正在崩溃，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最强大的国家的行为——正变得越来越受制于现有的规范。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欧亚国家都应该珍视现有的文明的国际交流方式。这对俄罗斯、中国或印度等大国，哈萨克斯坦等中等国家，以及欧亚政治中的其他伙伴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最后，使欧亚地区与众不同是，在这个新的国际环境中，不可能也不需要出现一个无可匹敌的霸主。这一地区包括至少三个大国，印度、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一些规模较小的重要国家，包括伊朗、巴基斯坦、越南和韩国。虽然在该地区不排除策略性的竞争，但它也可以促进一种独特的国际制度的出现。这意味着，只要国家间关系的民主和稳定性被认真对待，在此框架内创建和运作的超级区域性共同体就可以做得很好。因此，聚焦于对区域参与者的行动路径和表现进行比较，并将这些行动路径转变为制度和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国家间的关系是由性质和内容构成的，前者肯定比后者重要得多。如果性质是健康的，那么在内容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即使更广泛的国际秩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欧亚这样的超级区域层面，也可能有机会使其稳定下来。

(刘传平译，张翔、傅瑜校)

## Strategic Frivolity or New Balance of Power?

Timofei Bordachev

**Key Words:**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c frivolity; global domination; western liberal global order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time definitely stands out the most for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oday is the absence of generally recognized rules of the game and dominant players. Mutual respect is probably the scarcest commodity in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or even just major powers.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 Russia as a potential ally and they struggle for it. Europe is entering into a new age in a situation where Europe and the West as a whole will no longer enjoy a monopoly of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finale of the Western liberal global order did not lead to a new, more just for all arrangement. The world has entered into an apparently lengthy diplomatic and hybrid – typ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The period of relative uncertainty, which emerg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relative weakening of the West's omnipotence, is being replaced with a new struggle for global domination.